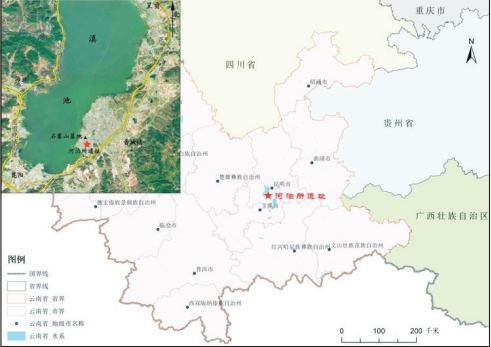


有汉之治 西南华光

——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发现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泊所遗址群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石寨、金沙村范围内，西邻滇池，东部被梁王山、左卫山、金沙山、龙潭山合围，东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约1千米，遗址面积约12平方千米，核心区为3平方千米。《汉书》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莽曰就新。属益州。应劭曰：‘故滇王国也。’）”（括号内为原文注释）根据2014年以来的考古工作，确认河泊所村片区为滇文化核心区，推测上蒜镇第一小学周边区域为汉代益州郡治所在。为进一步探寻益州郡治城市布局，202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宁区文物管理所、云南大学在河泊所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在城市考古与出土简牍、封泥的保护释读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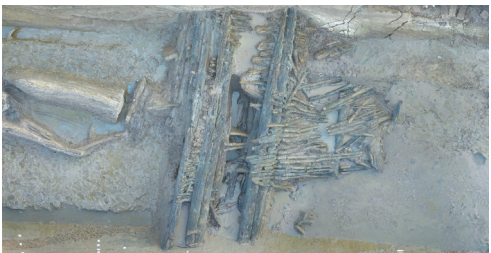
河泊所遗址所在位置

城市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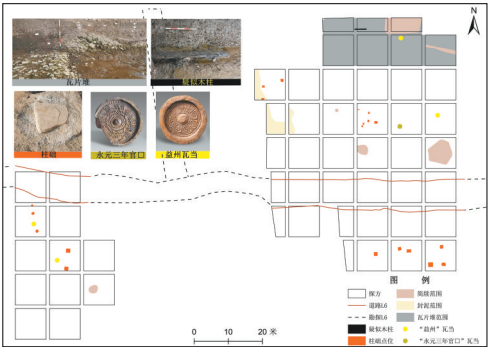
就目前出土遗物及测年数据看，遗址年代涵盖商周至明清，主要堆积为春秋战国至南北朝中期，勘探发现环壕及城市核心堆积区约18万平方米。上蒜一小地点西南部发现连续叠压的三期城墙与壕沟，城墙下存在大型木构。贯穿北区、西区的道路L6为东西走向，分五层铺筑，部分层配有路沟。L6③至L6⑤层与二期城墙共时，为春秋战国至两汉，最上L6①层晚至南朝到唐代。北区和西区还发现房址、灰坑、土坑墓、瓮棺等遗迹。另在北区的北部发现厚约0.4~1米的瓦片堆积与疑似木柱残留，其西南有以碎螺壳圆形环绕的方形石柱础，东南出土“益州”“永元三年官口”瓦当，附近水井及灰层伴出大量两汉简牍、封泥，推测此处存在大型官署建筑。这些发现为揭示汉代益州郡城址结构布局提供了最新材料。

行政区划

目前已发现封泥1900余枚，其中有字封泥1790枚，官印封泥数量最多。官印封泥中既有与



城墙下大型木构航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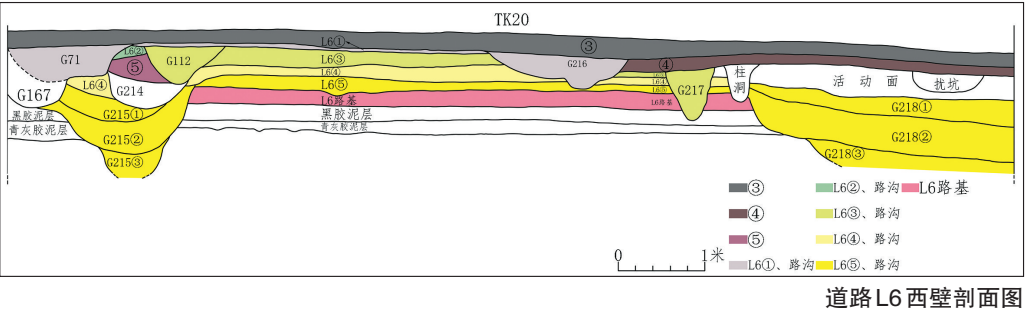


上蒜一小地点官署区及重要遗物分布图

滇国相关的“滇国相印”“滇王相印”“□滇丞印”等封泥，又可见增设益州郡后的官秩如“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益州长史”及益州郡下辖二十四县中“滇池长印”“双柏长印”“铜濊长印”“建伶令印”等十九县官吏的封泥，这与简牍释读出“滇国”“滇廷”“滇丞”以及“滇池”“来唯”“焉唐”“秦臧”等二十四个县名相互印证。结合过去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遗物分期，推测此时存在新旧制度交替、汉滇文化并行的情况。简牍中还发现诸如“益州郡滇池县庾同里”等有关基层乡里之治的内容，可知汉武帝统御西南，册封滇王后，在滇池地区迅速建立起行政区划和职官秩序，已形成郡—县—乡—里四级行政体系，主要官职有太守、长史、长、丞、尉等，另有中央派遣刺史监察地方。部分官印封泥也间接反映了西南其他地区纳入中华疆域的历史。牂牁郡系夜郎国臣服汉王朝后所设，“牂牁郡尉章”封泥与益州相关封泥同为中央王朝通过推行郡县制，对边疆地区实施有效行政管辖之实证；“交趾太守章”可窥见西汉疆域南扩之历程；“永昌太守章”则反映了东汉时期哀牢内附，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壮大的史实。

治理体系

至今河泊所遗址已出土简牍5万多枚，有字简牍5000余枚，纪年简可辨年号从始元四年（公



道路L6西壁剖面图

元前83年）至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是云南目前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文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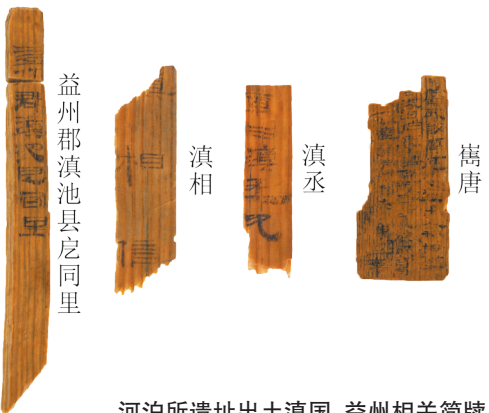
秦汉时期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邮书传递制度，保证政令下达，以管控地方。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滇池以亭行”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封检反映了其中两种邮书传递方式。“滇池以亭行”为秦汉封检题署的常见格式，“以亭行（以邮行）”前是文书发送目的地。张家山汉简载“书不急，擅以邮行，罚金二两”，“益州太守府以邮行”封检题字既体现了所传文书的紧急和重要程度，又可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远县令邮行之”相互印证。

简牍中有多件户版，如“铜奉宗 宁口里户人仕（士）伍奉年卅五算（算）一卒 贫……”，可见在当时今云南地区已推行编户齐民制度。“建伶髡钳皂屯代杨闲”木牍的记录格式与东汉洛阳刑徒墓地墓志砖铭文一致，是汉朝代刑情形的体现。一件由富剿发给青、平等人的书信简所使用的“伏地再拜请”“足下毋恙”“春时不和”等用语也见于同时期其他地区出土的简牍书信中。

“以邮行”“以亭行”封检及其他大量出土文书表明，河泊所遗址可能存在收发文书的邮驿中



河泊所遗址出土滇国、益州相关封泥



河泊所遗址出土滇国、益州相关简牍



河泊所遗址出土邮驿文书信件简牍

心，通过邮驿网络的覆盖，中央王朝达成了对西南边郡的有效治理。河泊所遗址出土文书在户籍管理、律法实施、书信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与中原的一致性，表明中央对益州郡的管控和影响已经触及社会的各个层面。

地域交流

地域交流基于交通路网的铺设。秦修五尺道，汉在此基础上开南夷道，延至曲靖，“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河泊所遗址出土的一封泥匣上书“粹潼富里周得弟（第）一车辰”，另有简牍记“就（就）车一十九两（辆）”，说明当时滇池地区可能存在较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和车辆运输。设益州郡后，中央王朝建设的交通网络辐射至云南，经济活动也随之而向外扩展。另有两片“产巴郡江州”简牍，江州两汉属巴郡，南北朝时期改置江县、巴县，此二简应属汉代，是汉代益州郡与蜀地跨地域经济活动的证据。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遗物中也可见益州郡与周边郡政治互动的记录。由“蜀郡太守章”“犍为太守章”“越嶲太守章”“广汉太守章”等封泥及“荆州杨州青州益州”等简牍可知，益州置郡后长期与汉代诸郡县有文书往来。这些资料反映了秦汉大一统历史背景下，西南边疆各郡交流互动、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

社会文化

河泊所遗址还发现部分含道教色彩的封泥。“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是道教法印的一种，意为持此章者为天帝使者，有驱鬼辟邪、镇压猛兽、化解疾厄之用。《广弘明集》载：“造黄神越章，用持杀鬼”。《抱朴子》有言：“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以卦咒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又记载了吴地道士戴曷以越章封泥镇压大鼯去患者病斃的案例。



河泊所遗址出土有关地域交流的简牍

封泥“天父地母泰上帝泰丈人齐风阳天神辟厄”有敬拜天神尊长以求辟邪驱厄之意。先秦道家把天地喻为父母，《老子》有“天地母”之说，《庄子》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东汉对天的崇拜演变出更具体的概念，《尚书·舜典》载：“肆类于上帝”，王肃注“上帝，天也”，而马融注“上帝，大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丈人为老者尊称，颜师古注《汉书·卷七》曰“丈人，严庄之称也，故亲而老者皆称焉。”天君者，天神也。《后汉书·卷八五》记“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封泥文字体现了道教早期形成阶段对天地人伦的思考和敬畏。

随着益州设郡、汉人迁入，中原社会风尚传入西南，在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出土了大量汉代风格遗物，如“长乐”瓦当、环首铁刀、漆器等，简牍中还发现了记有《论语·八佾》中“季氏旅于”和“能救与对曰不”的残片，说明汉时儒学已传播到了滇池地区。此类汉式器物与儒家典籍、道教封泥共同呈现了西南地区各人群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交流融合的面貌，这对于深入理解有汉以来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

河泊所遗址发现类城墙的人工堆积、城内道路与疑似官署的建筑基址，以及“益州”瓦当、文书简牍、官印封泥等重要出土遗物，为推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关键实证。结合文献关于汉代益州郡的相关记载，基本可以确定河泊所遗址以上蒜第一小学地点为中心的区域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遗址的宏观聚落形态及结构布局基本明晰，填补了云南城市考古的空白。大量出土的文字材料是研究西南边疆，尤其是滇池周边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管控后，行政区划建立、社会组织结构变化、社会文化多元化等问题的重要史料。

西汉益州郡的设立是西南边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关键一环，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是我国古代边疆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有力史证，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执笔：蒋志龙 莫云裳 钟梓桐 谢雷敏 苏东晓）

共享文明记忆：大报恩寺全球征集启幕

那些曾见证海上丝绸之路辉煌的琉璃塔影，那些记录世界文明交融的珍贵典籍，那些承载着金陵古都记忆的文物残片，虽历经战火离散，岁月流转，却始终是人类文明图谱中不可或缺的璀璨拼图。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为“灾害与冲突下的遗产应对准备”，大报恩塔的兴衰重生，恰是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开启了一场以“共享文明记忆”为主题的全球行动，让毁于战火中的琉璃塔，借助全球藏品的实物征集、数字收集与研究以重获新生。这场行动不仅是对历史碎片的追寻与修复，更搭建起文明对话的当代桥梁。

2025年4月18日，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向全球发出征集令，诚邀各国机构、收藏家及公众共同参与这场全球重构行动——让沉睡的文物讲述历史，让消失的遗产重现当下，让长千里的文明灯塔照亮人们共同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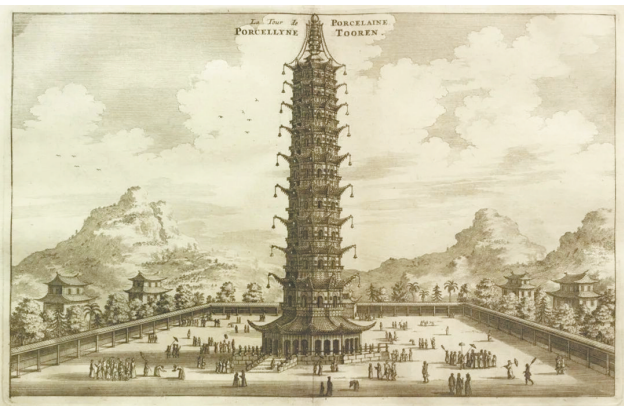
全球视野：大报恩寺见证东西文明互鉴



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永乐时，海外蛮夷重译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寥寥数语，生动描绘出明代大报恩寺的辉煌地位。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大报恩寺一直见证着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成为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篇章。大报恩寺历史可追溯至三国时期，历经南朝时的兴盛、宋朝时的推崇，几度兴废，传承悠久，直到明代永乐年间，大报恩寺迎来鼎盛时期，耗时17年，耗银248万两，建造出震惊世界的大报恩寺琉璃塔。这座以准官阙规格精心建造的宝塔名为“第一塔”，通高78.02米，相当于26层楼房的高度，九层八面，通体琉璃，不施寸木，被誉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从建造之初，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就流淌在大报恩寺的血脉里。按明制，国家营建之事要有内官监监督查，而当时的内官监正是七下西洋、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郑和。郑和从西洋带回了瓷器史上重要的钴料——苏麻离青，这也是琉璃塔烧制的主料，五彩琉璃映照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往来，塔

身上东南亚艺术风格的装饰更展现出不同文化间的艺术交融。同时，作为闻名全国的译经、讲经、刻经中心，大报恩寺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1598年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与大报恩寺住持雪浪进行了一场学术辩论。这场关于宇宙本体、造物主以及人性问题的东西方大辩论，既是基督教与佛教的对话，也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真正的文明，从不是孤立的辉煌，而是在开放与包容中，让不同文化的美彼此映照，生生不息。大报恩寺这座承载古都南京记忆的文化地标，以琉璃宝塔为枢纽，搭建起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鉴的桥梁。

全球珍藏：西方文明中的东方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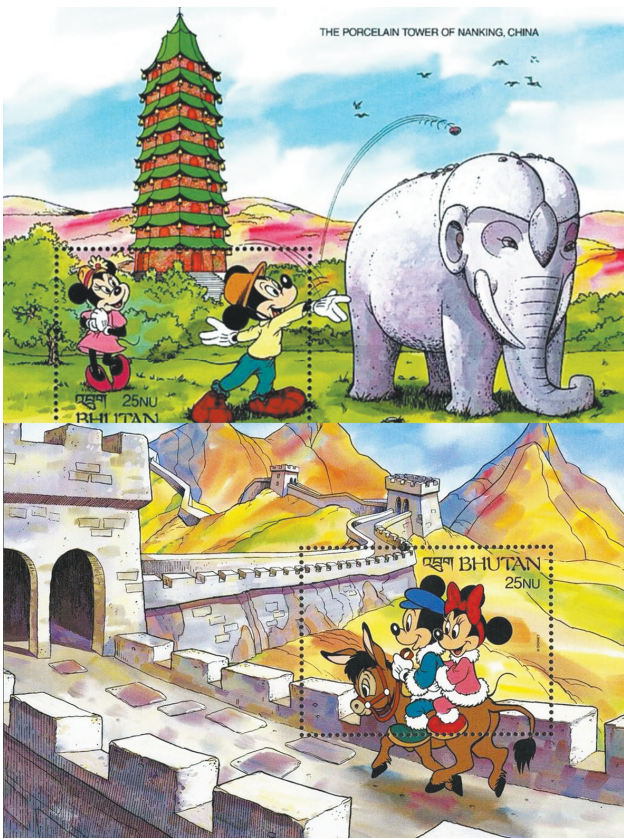
“我刚从中国来，我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叮当当地响起来！”《天国花园》中，安徒生笔下的“瓷塔”就是大报恩寺琉璃塔，这座宝塔成为欧洲人启蒙时期对东方世界的浪漫想象。1655年，荷兰人约翰·尼霍夫随使团访问中国，在《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详尽描绘了南京琉璃塔的壮丽，他的文字和插图让琉璃塔声名远扬，成为“欧洲最为知名的中国建筑”，可媲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中国万里长城等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建筑。

自17世纪起，以大报恩寺琉璃塔为原型的宝塔模型、建筑仿制品及艺术衍生品在欧洲广受追捧，甚至掀起了“中国风”潮流中的“宝塔狂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建“特里亚农瓷宫”，从琉璃塔中汲取灵感设计，宫阙外表面镶嵌瓷砖，并采用挑檐设计，檐下悬挂铃铛。英国建筑师威廉姆·钱伯斯直接参考尼霍夫的“瓷塔”插图，在英国皇家园林建“邱园宝塔”，塔体表面贴饰搪瓷，屋顶檐角饰以木质漆金的西方飞龙，塔顶镶嵌五彩玻璃。2009年，英国还发行了以邱园宝塔为主题的50便士硬币，将这一文化符号永久铭刻。

全球范围内，近10个国家的30家博物馆、收藏机构，研究机构藏有至少100件与琉璃塔相关的文物。这些珍贵藏品散布于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非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世界

文化殿堂，涵盖琉璃构件、瓷器艺术、绘画、宫廷家具等多个类别。这些散落于全球的文物珍萃不仅承载着大报恩寺的历史记忆，更是“南京瓷塔”流行于全球的实证。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围绕这些文物展开跨文化研究，在不同文化叙事的碰撞中，对文物及相关文化的解读研究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起全球共享的文明记忆。

全球征集：长千里的世界文明共享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猜。”诗仙李白一首《长干行》赋予了这片土地别样的诗意情怀。3100年前，商代先民就已在长千里垒土筑城，让这片秦淮河畔的土地成为南京最早的文明星火。岁月流转，长千里逐渐成为繁华的市井巷陌，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千古诗篇。而处于长千里文化中心的大报恩寺与琉璃塔，不仅是南京城的文化地标，更是市民心中的精神灯塔。

1856年，大报恩寺与琉璃塔不幸毁于战火。大量文物珍萃或通过贸易与外交流转，或因历史动荡流散全球。然而，这座“天下第一塔”从未真正消失，它早已化作文化的基因，深深镌刻在南京城的血脉之中。老宅墙垣中镶嵌的琉璃残片、樟木箱底珍藏的泛黄画稿、街头巷尾传唱的“长干塔影”传说，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见证着文明的延续。

“大报恩寺琉璃塔作为古都南京的地标性文化建筑，曾是西方人阅读中国最初的景象，在早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次全球征集活动，我们希望让散落的文明碎片重归故土，让消失的遗产重获生命、拥有未来。”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文溪如是说。此次藏品征集行动，不仅要做好基础的藏品收集与保护工作，将流落在民间的大报恩寺文物构件、遗址残片、工艺珍品等收藏品进行珍藏和科学的保存，还要重塑文化遗产档案，深入挖掘与收集大报恩寺及长千里地区相关的老照片、口述史、回忆录、艺术作品等。同时，通过与国际博物馆的合作，收集流散全球的文物与建筑高清图片、数字建模等数字化藏品，探索数字文明时代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重现“消失的遗产”。

“这是国家的宝贝，它的归宿应该是博物馆。”大报恩寺的藏品收集与保护工作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南京市民王陈鑫及其家人拒绝了外国藏家的高价求购，将珍藏的琉璃构件捐献给了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小捐赠者王珍墨捐赠了1991年不丹发行的迪士尼联名邮票，方寸间展现了琉璃塔与南京城的独特对话。画家徐开立捐赠了根据19世纪英国铜版画创作的《世界奇观——大报恩寺》油画。

藏品散落于世界各地，以无声的语言诉说着人类文明交流的悠久历史，彰显着全球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价值与责任。2025年，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迎来了开馆十周年。当人类文明之光与塔光交相辉映，这座曾照亮古都金陵的文化灯塔，将再次点燃文明互鉴的智慧焰火，见证一个古老民族在新时代的文化复兴与传承。



征集范围：
1. 古代文物：大报恩寺及古长干寺的佛教造像、工艺珍品、书画钱币等；
2. 境外文物：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及体现大报恩寺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证；
3. 近现代与当代文物资料：与大报恩寺及长千里地区相关的影像文献资料及艺术作品；
4. 数字化藏品：文物与建筑高清图片、数字建模、音视频资料等。
征集工作将严格执行文物管理规范，捐赠者可获赠捐赠证书或收藏证书，并予以适当奖励，有意向捐赠或参与者可咨询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征集热线：025-52657717、025-52009999，邮箱：linwanqiu1991@163.com。